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共早期留学干部的产生

张誉馨 李燕

【摘要】莫斯科中山大学是 1925 - 1930 年间在莫斯科开办的一所专门招收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进步青年并对其进行苏式政治理论教育及军事培养的高等院校。该大学应共产国际倡议而建，直接由俄共（布）管理。以往学界对中山大学的研究所多以国内的中文资料和档案为依托，并多侧重中山大学所发生的党派斗争之类问题。本文以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档案为基础，侧重对中山大学教学情况的研究和介绍，并分析在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对中共学员及共青团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莫斯科中山大学 留苏中共党员

20 世纪 20 年代，曾有 1400 余名中国青年前往苏俄学习，其中大部分人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称“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的，它是一所中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为基本定位的苏联高等院校。苏联建立该大学的真实目的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进步青年施加影响，将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布尔什维克”，为将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储备人才。苏联解体以来，学界关于中大的作用和影响评价不一，有学者因中大内部不间断的派系斗争而否定该校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校的很多毕业生后来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新中国各部门各领域的领导者。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在这所学校学习和接触到的内容，他们与苏共意识形态的思想碰撞，以及留学生活所经历的一切，对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及后来工作的影响值得探讨和研究。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与学校概况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孙中山去世之际，俄共（布）与共产国际为纪念孙中山而将学校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8 年 9 月后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该校是继莫斯科东方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大批招收中国学员的高等院校，也是唯一一所只招收中国进步青年的苏联高等院校。与其他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不同的是，该校直属共产国际及俄共（布）领导，是俄共（布）争取对中国国民革命领导权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建校的真实目的在于将中国的进步青年培养成合格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培养和储备领导人才，因而中山大学教学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校工作开始于 1925 年 8 月，192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首次“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学院”组建筹备委员会会议，当时鲍罗庭在讲话中对建立中山大学的主要原则进行了阐述，会议对建校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

1. 财政方面：将该校列入国家财政机构。首批招生名额为 250 人，根据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①的财政标准在 7 天内制定出详细的经费预算，预算中包括学生来俄所需的交通费用。

2. 师资与教学方面：师资主要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及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师与毕业生中引进，多方招选懂汉语的人才。马上将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巴维尔·米夫从乌克兰调回，命其担任学院秘书，并委托米夫在一个月内在提交由学院院长确认通过的授课教师名单；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由苏俄政治教育委员会与校方共同制定。

^①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Я. М. Свердлова）是 1918 至 1937 年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苏联共产党直属的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该校设在莫斯科，其职能是为苏联党政机关培养所需干部。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同时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

为保障建校工作进行顺利，特别成立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学院促进会”。1925年10月1日，进行了该促进会创建者的首次会议。促进会主席为该校首任校长、著名托派政治家卡尔·拉狄克，管理委员会成员为越飞、布哈林、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布罗伊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及苏联著名工会活动家安采洛维奇等。由此可见中山大学所受重视程度。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成立。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有两个情况值得特别强调：

一是学校建校的性质。莫斯科中山大学由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全额拨款，实属国立性质大学，但苏联政府对外称中山大学为私立院校，其目的是为避免引起西方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注意。在建校工作未展开之前，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就对关于建校的全部细节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计划，相关的此类文件都标有“绝密”字样。根据俄罗斯近代史档案馆中的解密文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于1925年8月3日致信俄共（布）宣传部并写道“将中山大学加上‘共产国际直属’的称号是太具挑衅性的行为，即使将其置于‘政府机构直属’、‘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或是‘职业教育管理总局’的名头下也很是不妥，因为这会使外界将我们与这所学校联想起来。我们应该找到这样一个社会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当与共产国际无关，并区别于政府机构，将中山大学置于其名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认为，应找到类似“远东、乌拉尔及西伯利亚科学研究协会”一类的学术组织，在其名下创建中山大学，且不会对共产国际创建该校的工作造成任何妨碍。当年8月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后，并未成功找到一个这样的组织，于是，临时决议“将中大定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直属领导下”。而后，托洛茨基亲自过问此事，并于1925年8月18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决议将中山大学定为教育人民委员会直属大学，请考虑这是否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困难。如果这样，中山大学将具有国立性质，而我们将无法再对外宣称它是一所私立性质的大学。”在托洛茨基的信被提交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对外宣称中山大学是由一个名为‘不干涉中国’的民间协会所创办。”该协会是于192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的；二是教学内容设置的真实用意。莫斯科中山大学虽然同时招收国共两党党员，最初在大学名称中也未冠以“共产主义”的字样，但这没有改变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宗旨。档案资料显示，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办学宗旨是直接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章程上修改而成的，即：“培养在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高水平工作者”。这一宗旨的制定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20年代，苏俄方面出于对其本国利益的考虑，与国共两党都分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联共中央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力量还不成熟，必须联合国民党，才有可能在中国革命中有所作为；从中国国民党方面而言，孙中山也希望争取俄方的支持，助其统一大业，由此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正式展开，第二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应运而生。不过，中山大学根据国民党党员对俄共及中共的态度，将国民党分为左派、中派、右派，所采取的策略是：联合亲俄亲共的左派，争取中派，孤立与消灭右派，旨在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因而事实上中山大学从开始就没有教授三民主义等国民党党员希望学习的内容，而是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一样，以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为主。

中山大学从建立到关闭共历经五年，这五年中学校的发展与中国政局变化以及苏联国内的政治氛围联系紧密。学校创办的第一年即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共两党党员学习氛围良好，虽有分歧，但求同存异。1927年4月12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同年7月26日，国民党方面宣布停止继续选派学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多数国民党党员提前回国。此后，该校只继续招收中共方面选派的学生。1928年9月1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做出决议，将此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学习的中共学员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并改校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事实上，自 1927 年起，在校内陆续出现各种复杂的矛盾纷争，此处不拟对其进行分析，但这些矛盾成为后来该校停办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校改名后好景不长，中共方面也表示无法继续选派学员赴莫。1929 年 3 月，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原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共选派 350 名留学生。但同年 5 月中共中央回信表示，因党内工作者不足，加之中苏交通几近断绝，无法再选派学员赴莫。1930 年 2 月 2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剩余学生全部转入列宁学院中国部，就此结束了这所大学五年的历程。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选拔工作

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的记载，中山大学第一批学生登记日期是 1925 年 11 月 23 日，共有 119 人。学校开办初期，学员数量增势迅猛，1926 年 3 月前，学校总人数已经由预算中原定的 250 人上升至 285 人，同年 2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会议则决议将学生总数增至 600 人。因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在 1927 年 7 月 26 日国民党宣布停止选派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中山大学变成了只对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招生的院校。以此为界，划分出该校 1927 年 8 月前与后的两种招生选拔工作原则。

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由国共两党分别选拔，招生地集中在湖南、上海、广东三地。中共方面的招生多由党内与团内推荐的形式进行，此外还选拔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进步青年入学。国民党方面在广东的招生过程很简单，笔试为撰写一篇以“什么是国民革命”为题的文章，之后进行面试，通过面试后最后入围的人选可以赴俄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除简单的招生考试外，并未对报考人员提出其他方面的限制和要求，且选拔过程中没有任何学校代表参加，这就使得所招学生未能符合学校方面对学员的要求。首任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 1926 年 6 月 16 日，即 1926-1927 学年度招生前夕致信上级机关，要求必须派遣了解学校情况的副校长米夫及教员达林同志前往中国亲自参加招生工作。同年 6 月 30 日，拉狄克收到关于拒绝这一申请的相关批示，但他并未放弃尝试，并再致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他在信中写道：“1925 年的学生选拔工作是委托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但他们对招生费用中 8000 卢布的花费没有任何说明，且几乎将所有希望来俄的学员都派来，事实上在广东没有进行正式的选拔工作，他们将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学生派来，结果他们成为了学校的负累，此外还有 10 人因病而不得不遣返。”问题得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重视，拉狄克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就“1926-1927 学年度苏维埃党校系统建立与完善”召开的主题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发言，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决议：“撤销此前的批示，同意拉狄克同志的建议，委派达林同志前往广东进行学生选拔工作。”在学校第一任校长拉狄克的坚持下，此后的学生选拔工作有了基本的原则，相对此前，生源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并开始扩大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招生。

由此，在学校首任校长拉狄克的坚持下，制定了更为完善的 1926-1927 学年招生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生源地：扩大对此前招生薄弱的中国中部省份学员的招收数量。

革命工作经验：所有入选者都应有不少于一年的革命工作经验。

出身：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兼收并蓄，可在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子弟中招收，但无论如何不应在富裕家庭子弟中选择，若在富裕家庭子弟中选择学员，则只有那些在 1925 年上海罢工事件前已经参加革命运动或群众组织，有一定经验的革命者可以破格入选。

教育层次：要求学生达到中等教育水平，并取得毕业证书。希望学生掌握一门属欧洲语系的语言。

政治面貌：要求选拔学生的总数中有 50% 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其中包括 20% 的共产党

员，以及 30%的共青团员。

性别：选拔的女性学员数量不得少于总数的 15%。

在年龄方面校方并未进行限制，这一点可以在档案资料中得到证实。根据对 1929 年 10 月 1 日前所有学生年龄的统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最小年龄为 15 岁，最大年龄的学生为 54 岁，平均年龄则为 23-25 岁。

1927 年 8 月起，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原则发生了变化：1927-1928 学年及 1928-1929 学年不再招收国民党党员。新的招生基本原则为：中共党员至少占 50%，共青团员占 30%，其余为非党员(主要为工人和农民)。其他方面的要求基本延续了上述 1926-1927 学年的招生原则。结合档案资料从招生省份、出身、以及入学前文化水平三方面对 1927 年 8 月前与后的招生选拔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

1. 在生源地及人数方面，1926-1927 学年度年各省（地区）计划招生名额与 1927-1928 学年度各省（地区）计划招生名额对比如下：

1926-1927 学年各地区计划招生人数		1927-1928 学年各地区计划招生人数	
江苏、上海	55	湖北(武汉)	141
广东	53	江苏	108
直隶（北京）	50	湖南	20
湖北	25	上海	18
吉林	12	广东	18
山东	12	山东	12
湖南	5	北京	12
辽宁	5	江西	7
河南	5	浙江	6
安徽	5	安徽	6
广西	5	福建	4
山西	5	河南	3
四川	4	广西	3
黑龙江	3	山西	1
浙江	3	吉林	1
福建	3	不明	167
贵州	3		
云南	3		
甘肃	3		
军队生源	20		
共计	280	共计	526

通过对比可发现，1927 年 8 月以后的招生工作确实侧重在中国中部省份及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省份进行，减少了偏远省份的招生名额。

此外，1927 年 4 月 12 日，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不再选派学员赴俄，因而，在扩招近两倍的情况下，国民党力量雄厚的广东省生源数量明显下降。而 1927 年 4 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所以中共力量集中的湖北省招生数位居第一，其力量相对较强的江苏及湖南也分列二、三位。为保存干部力量，躲避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党员的追捕，中共在 1927 年将很多被国民党通缉的干部也送往苏联学习。

2. 在家庭出身方面，根据对 1929 年 10 月前所有中山大学学生家庭出身的调查，总计 526 人中有 160 人来自农民家庭，114 人来自商人家庭，70 人来自教师、医生及工程师家庭，51 人来自工人手工业者家庭，36 人来自国家机关人员及知识分子家庭，30 人来自官员及军

官家庭，16人来自工厂主、地主及土地出租者家庭，另有50人不明。从这些数字来看，招生工作大体遵循了此前所规定的在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子弟中招收的标准。

3.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根据对1929年10月前所有中山大学学生教育水平的调查，有63人已经获得高等教育学历；117人受过高等教育，但未取得毕业证书；201人为中等教育水平，已获毕业证书；117人为小学教育水平；1人受过家庭知识教育；4人未受过任何教育；另有24人情况不明。总计527名学生有381人受过中等层次以上教育，占72.3%，基本满足了学校制定的招生要求：学生达到中等教育水平，并取得毕业证书。但因1927年后还选拔了一部分工人、农民入校学习，所以仍有部分学员文化水平较低。

由此可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工作遵循了校方所制定的招生原则。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存在四种班级：预科班、普通班、特别班及短训班。

预科班以俄语为主，专业常识为辅，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俄语，顺利进行后续学习。

普通班是学生预科结束，开始专业学习的班级，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辅之以军事训练。

特别班是为一些表现突出、入校学习时已经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者而开设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更高的水平，侧重培养领导能力。中共延安“五老”中的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都曾在特别班学习；邓小平、傅钟等人也在当时国共两党党员人才最集中的特别班——第7班学习，当时第7班曾被称为中山大学的“理论家班”。

短训班是对特别选派的学员进行短期强化培训的班级，一般以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为主，培训时间一般为几个月到一年，目的是使这些学员能在短期内学习实践知识，以尽快返回中国从事党政军工作。当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有这样的短训班存在，朱德、杜基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欧阳钦（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等人都曾在东方大学军事短训班中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学制设定为2年，自1927—1928学年起，将学制增加为三年。原因有两点，一是从该学年起，中共派出的学员很多是在工人和农民阶层中选拔的，他们文化水平较低，且抵达莫斯科时间较晚，通常在11月和12月，浪费了很多学习时间。二是因学校缺少称职的中国教师和翻译。1927年下半年，斯大林对于托派分子的清洗已经开始，中山大学以校长拉狄克为首的托派教师均被免职，一时教员奇缺，教学进度缓慢，只好延长学习时间保障学习效果。虽然增加学制，但并不增加学校总体预算，且对于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不延长学制。

1929—1930学年开始前，除预科班外，学校已经有三个年级的学生同时进行学习，从教务部所制定的一份1929—1930学年度课程课时计划表我们可以了解到学生们的课程安排情况。

1929 - 1930 学年度课程课时计划表

学科名称	预科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总计
		上学期(17周)	下学期(18周)	上学期(17周)	下学期18周	上学期(17周)	下学期(18周)		
政治常识	140						学习周(12周)	实习周(6周)	140

政治地理学	140								140
自然科学知识	140								140
数学	210								210
汉语	420	102							522
俄语	420	204	216	102					942
经济地理学		102	108						210
社会形态发展史		170							170
苏联社会制度讲解课程			36						36
中国			144	102	108	68	48		470
军事		68	72	34	36	34	24	12	280
世界历史			108	102	108				318
主题讲座		34	36	34	36				140
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历史				136	180				316
党的建设				68	144	102	72	103	494
政治经济学				136	144	136			416
殖民地政治学							96		96
苏联经济政治政策							24		24
列宁主义						70	96		166
辩证法及历史唯物主义						102	72		174
苏联宪法及苏联建设							24	72	96
翻译工作						204	144	72	420
参观游览活动	70	68	72	34	36				280

通过上述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对中山大学的学制以及教学基本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预科班阶段最重要的科目是俄语和汉语，其次是数学，再次是自然科学、政治常识、政治地理。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是为之后的经济理论学习打下基础；政治常识、政治地理则是为政治理论学习进行铺垫。

在一年级阶段，考虑到俄语的复杂性和提高学员文化水平的必要性，仍保留俄语、汉语课程。并增设社会形态发展史、苏联社会制度讲解、世界历史等适于起步期理论学习的课程。一年级下学期增设中国国情课程，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此外，学生们还能学习到一门起源西方，但国内未曾开设的课程 – 经济地理学。

学生升入二年级后，保留了中国国情、军事、世界历史三个学科，并增加了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历史、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三个学科。教学重心也转移到这些苏联希望传播的

课程上。二年级加强了世界历史的学习，这门课富有趣味，且能帮助学员拓宽眼界，了解国际形势。

三年级学生继续学习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并增设殖民地政治学，列宁主义，苏联经济政治政策，苏联宪法及国家建设等与苏联社会体制有关的课程，同时增设辩证法及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留学中山大学的学员中有很多人之后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领导人才和各行各业栋梁，而这时期的课程为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体制，借鉴苏联国家建设经验提供了契机。三年级还设较多翻译工作课时，因他们俄语水平较高，可为低年级担任课堂翻译。此外，他们还参与了学校出版的一些著作的翻译工作。

当时中山大学学生学习的重要课程内容有：

1. 经济地理学：世界经济地理，典型国家经济形势分析(欧洲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及各国殖民地)。

2. 俄语（低年级）：俄语语法，俄语口语及书面语的发展，阅读与写作方法。

3. 社会形态发展史：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形态，氏族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与贸易。

4. 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主义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及党内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政策，党建工作，党小组结构与工作，选拔入党及党内社会成分的调节，干部培养与干部考核，党的领导工作形式与方法，党和群众。

5. 辩证唯物主义：柏拉图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乔治·贝克莱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辩证法，马克思主义，阶级思想及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理论。

6. 政治常识：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苏联、中国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和政党，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道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任务，现代资本主义与苏联，现代中国，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

7. 世界历史：英国工业革命，伟大法国革命，英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欧洲 1848 年革命，美国 18 世纪革命，美国 1861-1865 年南北战争，日本 1863 年革命。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政策，第一国际，1871 年巴黎公社，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与社会政治关系，帝国主义时代的工人运动及国际，东方国际革命运动的崛起，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危机。

纵观整份课时计划表，会发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理论知识较多。从课程设置来看，除汉语与俄语两科基础必修课程外，占据课时最多的课程就是党的建设，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历史所占课时也颇多，苏联方面的建校意图可见一斑。

将整个课程设置状况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一门课程从一年级至三年级始终开设，这就是军事课程。除军事理论课程外，学校在每个暑假都会为学生安排军事实践活动——军营训练。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军事训练班的倡议始于 1926 年初。在 1926 年 2 月 11 日政治局会议上，应当时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武恩什利赫特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倡议对关于军事训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颁布了以下决议：1）在暑假期间通过组织军事训练营的方式为中山大学学员提供一些实际军事知识；2）为培养未来的军事工作者制定长期训练班教学计划，计划应包括军事课程、政治经济课程及其他专业知识课程。

以 1929 年 6 月为例，当时的训练是在莫斯科的国防航空与化学建设协助会的军事训练营中进行的，共有 423 人参加了此次军营训练。这次训练开始于 1929 年 6 月 30 日，时间为 12 天，每天正式训练时长 5 个小时，总课时 60 个小时。其中，战术战斗编队准备训练占 39 小时；射击术培训占 16 小时；战斗技术设备研究占 5 小时。在总课时外还另设有专项训练课时及共 4 节（4 小时）的政治课，所有学员每天进行 25 分钟的体能训练。

从以下资料可以了解到，学生们在军营中的训练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实用的陆战经验，

也涉及到了对一些军事设备的认识和操作：

1929年夏季莫斯科中山大学军事训练营课程计划表

(一) 战术战斗编队准备培训内容包括：

单独队列训练：站立、转体、前进、持武器姿训练；(3小时)

分列与整队训练；(4小时)

学习如何利用地形，如何隐蔽，如何目测距离，如何画草图；(8小时)

情报侦察术；(6小时)

行军与守卫技术；(6小时)

射击军向敌方进攻术；(6小时)

射击军自卫术。(6小时)

(二) 射击术培训内容包括：

对武器装备的使用进行简短复习，包括：步枪，左轮手枪，手榴弹的使用与保存。(5小时)

射击训练：在不同姿势下进行射击，据枪与瞄准。(5小时)

真枪射击练习(战斗步枪)。(6小时)

说明：战斗步枪训练在主靶场进行，小口径武器射击训练在室内靶场进行。

(三) 战斗技术设备研究：

1) 军事化学。化学在战争的应用，苏联军事化学技术；毒性物质；化学进攻与化学防卫；防毒面具装置。(1小时)

2) 装甲车与坦克。(1小时)

3) 空军。空军的地位和作用，空军侦察、空中歼灭、航空轰炸、空中战斗及其应用。(1小时)

4) 防空学与防化学等防卫手段。(1小时)

5) 炮兵：炮兵种类、使用步炮协同战术的必要性。(1小时)

说明：此处安排的课时只是对相应科目进行简短认识，事实上对于这些设备的深入学习还会在有足够课时的参观实践活动中进行，参观地点包括坦克团、飞机场、装甲营、炮兵部队等地进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将去往毒气熏检营进行实习。

(四) 体能训练：

1) 每天早上早饭前 20-25 分钟：行军、跑步、野外障碍训练。

2) 每天在课时外 30 分钟至 1 小时：越野障碍跑训练，并使用冷兵器(刺刀)对敌方进行敏捷而有力的打击。

3) 课外游戏：足球、篮球等。

(五) 政治培养：

主要由政治指导员进行，一些享有盛誉的苏联领导同志到训练营进行主题讲座。

讲座主题包括：

1) 国外军队武装的发展及练兵备战状况。

2)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至今的现代军事技术装备。

3) 现代战争基础理论，未来的战争。

4) 战争与工业。

5) 防空与国防。

6) 军工企业宣传。

7) 射击训练班及军事理论班的组织与工作。

- 8) 航空、化学队伍的组织与工作。
- 9) 国防工作，航空与化学建设协助会的工作。

此外，训练期间每昼夜都有学员站岗执勤，每小时换岗，每日有值日学员。为规范学生们在军营中的生活，还制定了相应的作息时间表。

起床	6: 30
早间洗漱	6: 30 – 7: 00
早操	7: 00 – 7: 25
早饭	7: 30 – 8: 00
野外课程	8: 00 – 13: 00
午饭与休息	13: 00 – 15: 00
附加课程	15: 30 – 17: 30
各种文化娱乐活动	18: 00 – 20: 00
晚饭	20: 00 – 21: 00
电影	21: 00
休息	22: 30

除军事课程外，从预科直到二年级，参观游览活动也始终存在于学员们的课程安排中，且占不少课时。包括盛岳、蒋经国、王凡西在内的许多留苏学员在之后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提及，并描写了他们当年参观时的见闻。蒋经国就曾表示，当年在参观活动中所见到的苏联先进工厂、农场以及飞机制造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观游览活动增进了学生对苏联社会的了解，改善了他们枯燥的异乡生活，增加对学习的兴趣，且能提高他们的俄语水平。虽然当时他们所参观的地点未必能够代表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但却增进了学生对苏联社会的了解，引发了他们对于苏联社会制度、领导体制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

莫斯科中山大学中走出的中共学员

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培养的中共学员中，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并献出年轻生命的优秀工作者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赵一曼、左权等人，也有经历磨练后幸存下来成为新中国党政军领导的人物，如叶剑英、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等人，他们在苏所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他们此后的工作提供了参照和经验。

董必武 1928 年赴中山大学学习，1932 年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此后任最高法院院长等职，是新中国的专业法学家。他强调要“政法结合”，吸取“我国历史上和国际上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在法学教育上，他尤其提出要对苏联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曾说，“学习苏联是想看看人家法学教育是怎么回事，要学习苏联，且必须要学习，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同他们不一样，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去学习，不能完全照搬。”他提倡创办形式多样的政法学校，并为人民大学法律系请来了苏联法律专家，帮助教研室完成工作，他本人也经常与这些专家进行谈话。早年留苏经历影响着他对新中国的法律事业建设的观点和看法。

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也曾在中山大学学习，他曾与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作为中共苏区教育的奠基人，他主持在苏区建立 10 所高级列宁师范学校，主持编写新的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生活教育教科书。他确定了中央苏区教材编写的五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即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介绍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化的原则”。但同时他也考虑到了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本国的教育政策进行本土化的改进，例如，他下令重新编写来自苏联的《共产儿童读本》，认为“太偏于政治”。此外，他还主持编写《苏维埃教育法规》，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在叶剑英身上则能看到他在中山大学所受军事教育的影响。叶剑英对军事史有着特殊兴趣，且善用战术。留苏期间习得的许多知识让他印象深刻。他曾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山西战局》，在论述战略战术时他写道：“从前许多战例，消灭敌人有许多方法，冻饿可以消灭敌人，拿破仑在莫斯科就是这样被消灭的。疲奔可以消灭敌人，苏联内战时代，夏伯阳就是这样消灭哥萨克军队的……兵法要乘劳，要善于承其弊。”他的另一篇《东北的七年》中分析东北局势，认为应瓦解敌军中被威逼利诱为敌作战的中国人，引用苏联军事实例：“假使研究苏联内战史，便可以看出他们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围攻的时候，曾经在非常艰困的条件下，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到使敌我两军中止战斗，在战壕里开会联欢。他们工作的中心是向敌军启发其阶级意识，提高其国际意识，使两相对垒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军队在国际意识启发之下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重视军事教育，1948年，叶剑英受命筹办华北军政大学。办学之初极缺教员，他想到列宁十月革命后利用沙俄军官办陆军大学的经验和红军时期解决缺少教员的办法，在军中解放入伍的人员中选调了二、三百名受过系统军事教育、有军事技术专长的旧军官作为教员。身受军事教育之益，他领导军事院校一贯以教学为中心：在红军大学时期亲自编写教材、讲课；组织近似实战的野外演习，组织军事、政治学习研讨会，以提高教员的军事和政治理论水平。这些方法都与当时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有相似之处。

此外，回国后在军政界及教育界担任要职的中山大学学员还包括1988年当选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曾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195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等。

除上述学员外，还有一些学员运用俄语知识及在校期间的翻译经验，结合在其他领域所学到的知识，参与了新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翻译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校时已经开始参与马列主义、俄共党史、苏联政治经济等著作和教材的翻译工作，较为优秀的毕业生则参与了中大附属科研机构 - 中国科学研究所的一些关于中国史政经问题的翻译研究工作，且在该研究所中国研究生攻读副博士。这些翻译和研究成果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了宝贵史料。他们中的一些学生在回国后参与到编译工作中，翻译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等。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由曾留学中山大学，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张闻天担任。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列主义著作，翻译著作依据的蓝本主要来自苏联，该部主任张仲实及工作人员谢唯真、张锡畴、陈昌浩等人均毕业于中山大学。张仲实在莫学习时就从事教材翻译工作，在解放后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此后参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时负责《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组织领导和审稿工作；张锡畴则与师哲、李立三等翻译和校订了《列宁文选》两卷集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谢唯真曾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编辑和马列主义著作译核员，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主任。1938到1942年间中央编译部翻译修订的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在内的十部著作，及此后编译的《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著作与这些中山大学毕业的译者所做出的努力及他们的留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中国学员的思想影响分析

苏联解体前后至今，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与公开，国内学界对中山大学的科研成果不断地发表，对于人们了解中共与国民党的干部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有很大帮助。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其中的多数成果将注意力放在中大内部的教务和党务两派斗争上，以及关于旅莫支部问题、江浙同乡会事件，还有1929-1930年中国学生受到斯大林反托派清洗这类问题上。

同时，由于中文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相对于俄文更多些，上述话题具有较大争议性以及一些事件本身的错综迷离，使得这些问题一直被当作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的确，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曾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并且这些派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甚至因某些学员在那里学到的“作派”体现在他们回国后的工作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过，需要肯定的是，作为早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制定了比较规范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原则，学员在那里接受的是比较正规的教育，对于中国学员了解世界革命形势、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情况、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重要帮助。在向学员们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基础知识的同时，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教授学员们军事斗争的理论和经验，尽管有一些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但是对于提高学员的军事理论知识也有很大作用。另外，尽管学员中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不受干扰、坚持学习的学生也为数不少，如邓小平、聂荣臻、叶挺等，他们后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中国国情及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很快成长为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此意义说，中山大学对中共学员的正面的、积极的思想影响不可否认。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共为扩大对东方国家的影响，主要出于本国利益与对外战略考虑而建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其主要目的除了推广“世界革命”和扩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之外，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目的还在于为中国培养一批激进的革命者，可能的话，扶持一个亲苏的政权。在学校教学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某些教学内容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翻译人员不足、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等情况。但在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投入和师资支持，校方为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做了最大努力。在20年代后期，尤其是苏联刚刚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大幕，连苏联本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山大学的中國学生却享受较高的待遇，得到了很好的物质保障，这一点为很多学生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经常提及。在教学软件方面，学校从远东及乌克兰等地多方寻找能够胜任中山大学教学工作的人才；在教学硬件方面，拨款十几万卢布用于购买书籍资料，特别侧重购买非俄语出版书籍供学员阅读；并从远东和圣彼得堡的一些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寻找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书籍，且派达林等教授赴英国及欧洲各地考察，寻找并购买各自关于中国的书籍资料，以补充学生们所拥有的教学资源。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中山大学为每位学生包办衣食住行的财政支出详单，在那些清单中我们看到，学校为学生提供去黑海及太平洋沿岸度假的机会，每月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对于部分有家庭需要供养的学员每年提供资助金。学校为学员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正如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盛岳在其回忆录写道的：“我经常看到，那位莫斯科大学学生用部分时间来给中山大学用马车给我们拉来生活取暖的木柴，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他只穿着一件破烂的棉夹克，我能看出他冷得发抖，我知道，他自己家里也许就没有生火的柴。每当我吃着精美的饭菜，我知道，连我们的教授们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可以吃得这么好。”在苏联处于战略考虑而建中山大学的意图背后，我们不能无视那些中国学生在异乡所感受到的来自善良、单纯的俄罗斯民众的人文关怀。正因此，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苏联的烙印，老一辈中国革命家多数都有着浓浓的“苏联情结”。这种感情对于后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尽管国内学界对于中山大学的建校目的、教学效果及其作用和评价虽然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议，苏联建立中山大学的初衷也确实带着点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对中国革命主导权的政治目的，但是，中山大学在当时的年代为大部分未走出过国门的中共党员与进步青年传播并深化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使中国革命者们对先进的西方工业技术、军事设备以及苏联社会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了一些当时在中国无法了解的知识和技能。建国后，很多领导人所提出的效仿苏联社会制度、军事体系、教育制度，但并不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态度，都见证了他们对早年留学苏联中山大学时所见所闻的思考，也是他们在切身体

会中对两国国情和党情的把握。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ining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Chinese labors) from 1925 to 1930. 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Chinese labors) is specially established by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irstly, Chines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needed for more cadres.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of USSR wanted to spread the soviet communist ideology and maintain goo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Kuomintang),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USSR.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more than 1500 Chinese students –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gue members and the members of 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Kuomintang) were sent to 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Chinese labors) and learned there in the period of 1–3 years. These students were specially selected for learning the communist theory or military training. After graduation they came back to China and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Some students among them became to strategists, military leaders, or great general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 on the unpublished archives, the author analysed the role of 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on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vealed the training course, its purpose and training methods, summarized the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ult of the training.

Key words: 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 training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the USSR